

网络技术与网络文化的互动关系研究

张丽¹, 张明国²

(1. 重庆大学 贸易与行政学院, 重庆 400044; 2. 北京化工大学 文法学院, 北京 100000)

摘要:网络技术的出现与飞速发展及其对人类社会生活产生的重大影响已经远远超出了以往任何时代技术的影响范围和程度,尤其是在精神文化层面,与网络技术相伴而生的网络文化成为焦点。本文试图从网络技术产生的背景、主体、技术特征、语言等角度展开对网络技术文化特质的分析来揭示网络文化的本质特征,以此说明网络技术与网络文化的深层互动。

关键词:网络技术;网络文化;互动关系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03)03-0146-03

The Interaction Study of Network Technology and Network Culture

ZHANG Li, ZHANG Ming-guo

(College of Trade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4, China)

Abstract:The development of network technology has deeply infected the world, especially in mental and culture aspects. The paper tries to analyze the cultural character of network technology, in order to discover the internal relation between network technology and network culture.

Key words:network technology; network culture; mutual relation

从技术层面看,网络技术就是把空间上相互分散,而又具有独立功能的多台计算机,通过通信技术、连接技术联接起来,以实现计算机间的资源共享的技术。究其实质就是实现信息资源的共享和数据交换的无比迅速和便捷,是信息技术革命的产物,它极大地推动了信息化过程,极大地改观了人类获取信息的方式,使信息在短时间内实现最大范围的传播成为可能,从而节省了时间和成本,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的生存方式。所以有人说,网络技术并不纯粹是科技的进步,网络技术创造了一种新型的、前卫的、时尚的文化,它不是虚幻的,是网下的现实,即形成所谓的网络文化。桑新民教授在《探索网络文化视野中的教育新天地》中指出,网络文化有这样两层含义:一是指由国际互联网所创造的不同于以往文化形态的一种新文化;二是指对网络进行文化思考和文化研究。中科院院士罗沛霖进一步指出,电脑网络空间文化有两大类:一类是存在于电脑网络空间中大量的数字化信息,这些信息大多是传统文化内容经过“数字化”或“信息化”而产生的一种形式上的替代品,无更多新特点,并不具备一种新文化的基本特点。另一类是由于超文本、多媒体等新技术在因特网上的应用和普及,产生出许多全新的文化艺术形

式,代表了网络文化的本质和特征。罗沛霖院士关于网络文化的表述其实是对桑新民教授的第一层含义的深化。本文所说的网络文化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展开的。正如李克特所指出的“技术也应该是一种文化过程”^[1]一样,有人进一步提出网络技术本身就是一种文化,是文化的更高层次的发展。我认为,技术与文化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界倍受关注的领域,“技术-文化”研究也取得了许多重要的学术成果,“网络技术-文化”作为其子系统实有研究的必要;另外,网络技术又因为其自身的特殊性,使得它与文化的关系更为密切和复杂。有人甚至指出网络最本质的特征是交流与传播,基于媒介的传播活动驰骋于从微观到宏观之间的“技术-文化”广阔空间。网络“技术-文化”已超越了以往技术文化的“亚文化”地位。因而,使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更为复杂。目前关于网络文化的话题很多,但大多是从当前的网络技术文化的制度层(主要内容包括网络技术规范及网络运行和使用中的各种规则、政策、法规和道德规范)等外围展开对网络文化特点的分析,或是对网络进行文化思考和文化研究(桑新民教授的第二层含义)。

本文试图从网络技术产生的文化背景及目的,网络技术

收稿日期:2002-12-22

基金项目:北京市哲学社科规划项目“网络技术与文化创新”

作者简介:张丽(1972-),女,黑龙江汤原人,重庆大学贸易与行政学院讲师,主要从事科学哲学研究。

主体,网络技术的特定语言及网络技术的本质(从网络文化的器物层和精神文化层面的互动分析网络技术自身所蕴涵的文化特质),进一步揭示网络技术与文化的深刻关联:很大程度上网络文化与网络技术是相互决定的,这是一个被潜忘的前提。

一、网络文化对网络技术的影响

(一)网络文化是网络技术产生的直接原因及最终目的

正如技术的发展永远无法脱离其文化土壤一样,网络技术的发展也离不开其文化背景。透过网络的信息技术表层结构,可以揭示出其文化特质。

早期对网络的热衷者是一种具有政治热情,并以一种超技术的“文化”思维来对待网络问题的人。早在1972年《人民的伙伴计算机》中就有这样的呼吁“计算机基本上是用来反对人民而不是去帮助人民,它被用来控制人民而不是去解放人民。改变这一切的时机已经来临——我们需要——人民的伙伴计算机。”^[2]因此,伯克利地区的计算机迷建立了名为“资源一号”的“社区计算机公用设施”,并声明:“所有信息的数量和内容都是由权威机构决定的,比如出版社、电视台、电台、新闻社、智囊团、政府机构、中小学及大学;控制这些机构的正是控制我们经济生活其他方面的同一社会力量。他们自上而下地传递信息,使我们彼此隔绝。时至今日,计算机技术主要被政府以及政府所代表的社会力量用来快速存取大量的个人信息……这种信息传递的模式使我们相信,控制信息的流动是何等的重要。”^[2]同时,另一个被称为“社区记忆”的项目计划把整个旧金山海湾地区的小型计算机连成网络,每个终端都和“资源一号”的中央数据库和数据处理装置联接,免费向公众开放。甚至提出另外建立一套全国性的信息系统,利用AT&T公司的长途电话线路将美国的城市和大学连成一片,创造一个“直接利用信息的民主体系。”该项目的理论家之一迈克尔·罗斯曼解释说:“社区记忆”项目具有社会和公众参与的性质,它毋须对交流的信息作集中的编辑或者控制,它使用户可以直接获得信息。该系统与两种盛行的方式截然不同:电子通讯媒介是把中心所确定的信息传递给大量被动的听众或观众,而控制论技术则集中处理和控制在直接用户和间接用户获得的以及为他们提供的信息的预定目标而形成高效率,消除由一个团体控制双方(或多方)的信息传递所带来的问题。他把利用信息的权利交给公众,使他们具有更多的自由。在用户当中没有哪个群体有权利比另一个群体更多地获得重要的信息。正如加利福尼亚的一位州长所指出的“更多的人用更多的时间去收集、分析和处理信息,这是一种与我们所熟悉的完全不同的文化现象……只要一按按钮,人们就可以得到有关决策过程的许多信息……信息使人获得平等的权利,它将摧毁社会的等级制度。”^[2]由此可见,网络技术的产生除了技术背景,还有深刻的人文因素,甚至可以说,这种人文因素是网络技术产生的直接目标和动力。

(二)网络技术产生的主体

有人说网络技术的发展史就是一部网络精英史,因为可

以从网络技术发展的历史中找到一大批精英的足迹:从为阿帕网的建成作出巨大贡献的鲍伯·卡恩到当之无愧的阿帕网之父拉里·伯茨,乃至“互联网”之父文顿·瑟夫;从发明了“域名系统”(DNS)的保罗·莫卡佩特里斯,到编写能够发送E-mail程序的雷·汤姆林森和发明环球网的伯纳斯-李;从设计出第一个环球网浏览器“马赛克”(Mosaic)的马克·安德里森(后又与詹姆斯·克拉克共同设计了著名的浏览器——导航者(Netscape Navigator)到发明以yahoo作为用户的助手和信息检索器的杨致远和戴维·菲罗乃至因主持开发了“娃娃”(Java)而给互联网上大名鼎鼎的太阳公司带来新生机的詹姆斯·戈斯林……作为网络技术的发明主体,他们在建立和发展网络技术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带有某些人文色彩,如主体目标、意愿、价值趋向等。早期的计算机迷是一群独特的人:“不善交际,也不懂人情世故……仇视现存事物……主张无限制的自由,反抗任何形式的束缚……政治上的反抗性,科幻小说的奇想性,自己动手的自救论和逗乐嬉笑的奇异组合。”^[3]就象库恩提出的“染缸理论”,毫无疑问,这使网络技术的发展史带上了“个人英雄主义”的色彩。有人说“是他们缔造了最初的网络文化”^[4],网络文化首先就是这样一种精英文化。虽然互联网已从计算机天才的游戏场成为今天普通人也能够随意进出的地方,已完全被主流化,但互联网在起步阶段的一些基本文化特质仍顽强地保留下来。60年代后期嬉皮士运动所提倡的自治民主与民主观念奠定了计算机革命的基石。这种带有某种危险意味的无政府主义树起了反权威的大旗。斯图尔特·布兰德的“信息渴望自由”(information wants to be free)指出解放信息是网络的宗旨,今天这一宗旨已成为60年代自由意志论与90年代风险资本主义的一种奇异的混合物。由此可见,我们目前谈到的网络文化很大程度上是这种精英文化的折射。

二、网络技术对网络文化的决定作用

(一)从网络技术自身的特点分析

网络技术具有虚拟现实性,交互性,开放性,而依附于这种现代科学技术特别是多媒体技术的网络文化必然是一种现代层面的文化,是一种彻底理性化的数字文化,任何信息只有以数字的形式出现才能够被识别、理解和处理。反过来说,任何具体的特殊的传统文化只要它能够使自己数字化,就可以转化为网络文化。这也决定了网络技术文化或称“路径文化”的简单性、单一性、可逆行,可重复性。这些都深刻地改变着现实社会中人们的思维方式与思维习惯。正如美国心理学家与计算机教育家西摩·佩珀特(Seymour Peper, 1980)指出的“对于一个程序,不会去问它是对还是错,而是问它是否可以改好。”这对于纠正人们看待事物的非黑即白的观念具有潜在的影响。1984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劳伦斯科学馆的副主任阿瑟·刘赫曼进一步指出:“程序设计形成了计算机文化的脊梁骨。”而在此之前的1981年8月前苏联的计算机教育家叶尔肖夫(1981)在瑞士洛桑举行的第三届计算机教育应用大会的报告中提出,人类生活在一个“程序设计

的世界”,其中“最重要的是文化与程序设计的技巧不仅仅是并行而又相互联系地发展的,而且它们相辅相成,形成人类思想的一种新的融合。”

(二)从技术语言层面分析

网络技术语言是以 win95 为代表的应用技术软件作为其基本技术语言框架,但是它的运用范围远远超出了以往任何一种技术语言的应用程度,以至这种技术语言对社会整体都产生了非常强烈的影响。正如《华盛顿邮报》所描述的“不久的一天,人们终于发现自己生活在一种连做梦都没有想到的安适和方便之中,但条件是必须在这之前向比尔皇帝的软件帝国申请签证。”^[5]这要求人民在进入互联网时,必须首先学习特定的技术概念,运用某种专门的技术语言,“国际互联网已经并正在形成独特的文化类型,这种网络文化类型拥有自己独立的技术语言,自己的思维方式,自主的沟通标准,具有极为独特的生存状态。”^[6]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人说网络时代的文化惶恐和困厄,“滑坡”和“破损”首先就是由“计算机技术语言和语境突然地大量地未能很好转换地闯入日常生活语言所造成的。”^[7]更有尼葛洛庞蒂所说“在互联网域上没有地域性和民族性,英语将成为标准。”(事实上在互联网上 90% 以上的信息都是英文信息)。阿尔温·托夫勒在《权利的转移》中说:“世界已经离开了暴力和金钱控制的年代,而未来世界政治的魔方将控制在拥有信息强权人的手里,他们会使用手中掌握的网络控制权、信息发布权,利用英语这种强大的语言优势达到暴力、金钱无法征服的目的”。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发现网络技术无论从其产生背景、目的及主体方面都深深地刻有网络文化的印迹,纵观人类历

史中技术发展的历史,几乎所有的技术进步都有其文化因素;所有伴随而生的技术文化也都有其技术的某些特征。但是,由于网络技术的特殊性,使相伴而生的网络技术文化无论在形式还是内容上都与传统文化迥然不同。网络技术为不同文化的交流提供了一个平台,不同文化之间的接触(政治上称文化冲突和碰撞)将使不同民族、国家在技术、生活方式、价值观、文化交流方式与文化流动载体等方面,引起大的文化变迁。也许,计算真的不再只和计算机有关,它将决定我们的生存。但是谁又能否认这是人类历史上的又一次飞跃。“网络技术——文化”这一主题的探讨可谓前路漫漫,吾将上下而求索。

参考文献:

- [1] 张明国. “技术—文化论”——一种对技术与文化关系的新阐释[J]. 自然辩证法研究, 1999, (6): 15-19.
- [2] 罗斯扎克. 信息崇拜[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94, 126-132.
- [3] 邹智贤. 略论网络的文化特质[J]. 求索, 2000, (1): 67-70.
- [4] 黄华新, 顾坚勇. 网络文化的范式转换[J]. 自然辩证法研究, 2001, (12): 31-35.
- [5] 麦达利. 比尔·盖茨传[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5, 1-419.
- [6] 曹增节. 国际互联网的文化意义分析[J]. 文化研究, 1998, (7): 45-49.
- [7] 翁寒松.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网络文化[J]. 文化教育, 2000, (3): 133-134.
- [8] 张明国. 从对待技术与文化的态度看传统与现代的关系[J]. 人民论坛, 2002, (7): 12-15.

(上接第 145 页)

塞维斯在展开斯氏和怀特理论时,还批评了传统所讲唯物史观中过份实现阶级斗争地位和作用的思路。在他看来,阶级斗争并非人类社会进化的最终动力^[11]。从文化进化的终极原因看,从生产力决定性看,这一见解不无道理。阶级斗争只是文化进化中的一种较短期现象,文化进化的根本原因是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而不是阶级斗争。在社会的发展处于新旧制度交替之际,阶级斗争的确在某种程度上极大地推动了文化的进化。但是,在社会稳定地上升发展时期,鼓吹阶级斗争或煽动群体冲突却对人类有害无益。

参考文献:

- [1] 庄锡昌. 文化人类学的理论框架[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8, 60-61.
- [2] 墨菲. 文化与社会人类学引论[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1, 152

- 254.

- [3] 黄淑婷. 文化人类学理论和方法研究[M]. 广州: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1986, 284-307.
- [4] 蓝勇. 中国西部大开发的历史回顾及思考[N]. 光明日报, 2000-02-44.
- [5] E·哈奇. 人与文化的理论[M]. 哈尔滨: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88, 114-131.
- [6] 霍有明. 论唐诗繁荣及清诗演变[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 132.
- [7] 陈来. 古代宗教与伦理[M]. 北京: 三联出版社, 1996.
- [8] 夏建中. 文化人类学理论学派[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7, 227-228.
- [9] 怀特. 文化的科学[M].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8, 166-374.
- [10] 哈里斯. 文化唯物主义[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89, 83.
- [11] 塞维斯. 文化进化论[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91, 6, 23-24.